领导干部说话是个“技术活”

□王玉堂

“说话”是世界上最简单也最难的一种能力。话说得好，不仅三言两语就能切中要害、打动人心、引起共鸣，而且可以展现领导干部的自信与能力、思想与视野、智慧与艺术，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心路历程、雄才伟略。否则，越是滔滔不绝，往往越让人听起来云山雾罩、不明就理，甚至招致反感。“说话”的能力，是一个人知识积累、思想水平、工作历练、人生感悟的综合反映。对领导干部而言，话说得怎么样，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他的个人素养、公众形象和领导水平，体现着宣传鼓动、组织动员和落实执行能力。我国古代的思想家荀子说过：“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因此，领导干部必须深谙说话的技巧，提高说话的能力。

说短话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领导干部说短话，体现的不仅仅是作风、文风和“话风”，更体现素质、能力和水平。正如文学大师林语堂所言：“绅士的演说应该像女人穿的迷你裙，越短越好。”说短话，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关键是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提炼、勤于积累，并且要经常深入实际，吃透情况。这样，说起话来才能简短精炼、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观点鲜明、重点突出。当然，说短话并不是简单地限制时间，更不是唯短是美，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内容决定形式，宜短则短，宜长则长；“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说话也是这个道理。

说实话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领导干部说话必须遵循的重大政治原则。说假话而不说实话，有百害而无一利。说实话，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和沟通的基础，失去它，就失去了与人相处的基本资格；说实话，彰显的是一种传统美德、一种政治品格、一种责任担当、一种素质能力，而鼓励说实话，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政治胸怀。说实话，就是要敢于坚持真理，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勇于发声，用自己的话语权，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就是要排除私心杂念，敢于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发表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看法；就是要开诚布公、坦诚相待，不绕弯子、直来直去，言而有信、一诺千金。

说新话

俗话说：“好话重三遍，鸡狗不待见。”喜新厌旧是人的本性，再好的讲话，再优美的语言，说得多了也没有人愿意去听。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说话必须有新意，就是要力求思想深刻，不落俗套，不人云亦云；就是要少说“普通话”、多讲“地方话”，少说“书”话、多说“人”话，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让人听了感觉新鲜、解渴、管用。“新”由“心”来，言为心声。说话前，对想说的内容事先要进行缜密思考，形成基本的思路和框架，即使是旧主题也要有新思维、新角度，旧观点也要有新材料、新论证，旧材料也要有新概括、新见解。对重点内容，要字斟句酌，反复研究、思考，反复比较、推敲，反复提炼、升华，增强逻辑性和针对性，彰显语言的力量。

说自己的话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一个领导干部有没有水平，说出来的话群众愿意不愿意听，关键就看你有没有思想、是不是说自己的话。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对诗学也很有研究。相传某日有人拿了自己的诗作，向黄宗羲请教。黄宗羲翻开诗稿，刚看了几句，就说：“这是杜诗。”再往下看，又连声说道：“杜诗！杜诗！”来人受宠若惊，喜形于色。要知道，杜甫可是诗圣呀，自己的诗被当作是杜甫写的，不就说明自己和杜甫水平相当了吗？可是黄宗羲接着说：“诗的确像杜甫的诗，可是你自己的诗在什么地方呢？”来人听了颇感失望和尴尬。不过，经黄宗羲这么一点拨，此人豁然开朗，从此下定决心，抒发自己的感情，说自己的话。说自己的话，最根本的是要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这就需要领导干部要善于学习，并融会贯通。不能照本宣科、生搬硬套，甚至生吞活剥上级领导的讲话及文件，要在认真学习领会并掌握其精髓要义的基础上，经过独立思考、消化吸收，渗透进自己的理解和智慧，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语言；要善于提炼、概括，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要多读些经典理论书籍，打牢理论功底，使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要深入调查研究，力求掌握基层第一手真实材料，使自己的见解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时效性和鲜活性；要独树一帜，形成风格。通过长期的实践、锻炼和体验、升华，逐步形成自己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或深邃睿智，或调侃幽默，或简约传神，或通俗易懂，努力做到个性独具，听其言便知其人。

说群众的话

群众的话，生动形象、通俗易懂，诙谐幽默、新鲜活泼，言简意赅、以小见大，不仅充满智慧和哲理，而且富有感情色彩，传递着重要的民情信号；一句民谣、一个段子，往往折射着深刻的社会问题和群众的喜怒哀乐。领导干部要善于倾听、学会使用群众语言，说群众的话。这不仅是一种能力、一种修养、一种境界，更是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要求，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说群众的话，就是用群众的语言说话，用群众的语言为群众说话，说能说到群众心里去的话。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牢记党的宗旨，切实转变作风，经常深入群众，真正融入群众，始终与群众心相连、情相通、话相投。同时，还要认真揣摩群众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不断用基层鲜活的语言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话语体系”，去掉官僚气，多点乡土气，用群众的话、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表述观点、亮明主张，从而形成共识、获得支持，促进工作、推动发展。

（作者系山东省东平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用法治和制度破除“圈子文化”

□刁兴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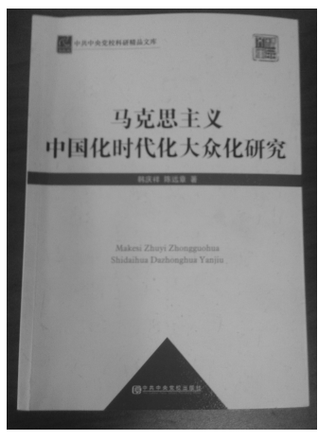
圈子原本是指人与人因为志趣相同，爱好相同或为了某个特定目的而联系在一起的人群。志趣相同、爱好相同、结伴临溪、坐而论道都不失为人生的一种乐趣。但是社会特别是官场流行的某些圈子却完全背离了其本质。不少人削尖脑袋钻圈子，千方百计扩圈子，形成了一种繁荣的“圈子文化”。所谓“圈子文化”，就是一些官员结党营私，为一己之利编制利益同盟，或官官相护，热衷于拉关系、架天线，或是搞山头，把分管的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层当成家臣，或是官商勾结、搞权钱交易。去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情况显示，这些团团伙伙的不良风气在不少地方依然存在，问题不容小觑。在通报四川情况时，采用了“官官勾结，官商勾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的表述；广西一些领导干部被指任人唯亲，搞小圈子；江苏一些领导干部与老板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圈子关系，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河北个别领导“搞团团伙伙，并与企业老板结成利益纽带。”“圈子文化”是一种封建文化、庸俗文化、没落文化，具有依附性、投机性、帮派性、顽固性、贪婪性的特征。去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办的国家发改委系列案件，就查出11名局级干部，其中价格司原领导班子大多数涉案，这些官员身处同一个圈子。查处的类似“官员勾结”的圈子屡见不鲜，某个高官落马后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甚至涉及一个单位或整个行业。官员与商人勾肩搭背也是圈子的重要形式，他们相互勾结、各取所需。

“圈子文化”的源头是封建专制，是人治。封建专制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有法律无法治，封建专制的残余至今仍然存在，致使人身依附、等级制度、门客政治等在党内仍有市场，并且在思想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今天有所发酵。一些人把组织当成朝廷，搞任人唯亲，进行人身控制，围绕自己打造盘根错节的现代“宗族”，把正常的同志关系江湖化。“圈子文化”从形式上看是党内宗派主义的变种，每个小圈子就是一个小团体、小山头，它强调局部利益，无视整体利益，通过内部的“潜规则”绑架组织。“圈子文化”从本质上看是利己主义，围绕一个“私”字，混进圈子的人，无非是为了获利，归根到底是个人利益同盟，将利益交换关系发展为“人情”关系，为其赤裸裸的目的蒙上一层“人情”面纱，结圈、进圈的人心态各异，形式不同，但目的是为了从圈内获利。

“圈子文化”危害极大，必然导致坏党乱政。搞圈子的人常以“乡缘”“学缘”“业缘”等架天线，搞勾兑，使圈里人只知门户、不知组织，只知私利、不知公义，只知圈情、不知民意。它容易形成空谈淘汰实干，关系淘汰能力。尤其严重的是它破坏党内团结，践踏党内民主，阻碍政令畅通，助长家长制、一言堂，必须予以破除。邓小平曾告诫全党：“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很多失误就是从这里来，很多错误就是从这里犯起。”习近平总书记说：“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拉拉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以利相交，利尽人散，古往今来，结党营私的人都逃不掉树倒猢狲散的结局，“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就是例证。与其追逐官场的“圈子文化”，去做某领导的家臣，不如把心思放在工作上，用扎扎实实的政绩证明自己的能力。有能者居之是千古之真理，那些进圈子、靠关系的人，看似顺风顺水，实则饮鸩止渴，为某领导鞍前马后是走不远的。

破除“圈子文化”的方法很多，只有坚持用法治和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法治破除“圈子文化”，必须坚持依法治腐、依法治权、依法行政。依法治腐就是把反腐败纳入法治化轨道。无论什么人，只要搞腐败，都要依法惩处，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苍蝇，即使进了圈子，也是徒劳的；依法治权就是把权力法治化。权为民所用、权为法所限，依附权力没有了依靠，自然也就无需进圈子；依法行政就是依法约束行政行为。目前重点是制定各级政府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使各级政府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企业“法无禁止皆可为”，也就是明晰政府权力边界，让“圈子文化”无法渗入。用制度破除“圈子文化”，必须坚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当权力不再是可寻租、可牟利、可替人办私事的资源，当权力回归为正常，“圈子文化”才能失去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圈子才无法发挥作用。

深入规律层面的学术思考



□李海青

作为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根本性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有效发挥作用，而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三个维度。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韩庆祥、陈远章的学术新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就是这一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力作。

本书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特点。

一是系统性。既表现在研究主题的系统性，也表现在研究框架的系统性。就研究的主题而言，这本书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视为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功用问题的三个不同层面，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放在一起深入研究，突破了以前研究大多囿于某个方面或维度的局限性，能够完整而立体地展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状况。就研究框架而言，本书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化”问题既有理论的思辨，又有历史的审视，既有现实境遇的分析，又有推进路径的阐释。理论与现实，历史与当下，中国与西方，问题与对策，分析系统严谨、逻辑清晰严密。进而言之，整体框架中的每一部分内容在研究与阐释方面也都具有自身的系统性。

二是现实性。该书始终体现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与强烈的现实关怀。该书认为，马克思主义“三化”就是在问题意识的不断产生中推进的，“三化”的精神实质就蕴含在其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中，提出要运用“背景—问题”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三化”，切实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创新的基本路径及其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问题，解决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之影响力的实现路径和实现方式问题，解决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问题。以此理念为指导，该书借鉴评价企业常用的SWOT分析即强弱机危综合分析法，对马克思主义“三化”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给予了全面的梳理：从内部条件分析其优势（Strength）和劣势（Weakness），从外部环境分析其机遇（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s），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三化”推进之策。这种现实性的致思理念既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性，也使得该书的研究具有了现实的价值与意义。

三是创新性。围绕“三化”的研究主题，按照系统的思路框架，针对现实的问题境遇，该书提出了一系列的创新性理论观点。比如“三化”的研究要突出问题意识、整体把握与学理支撑；“三化”的理论基础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解决的问题蕴含其精神实质；“三化”的历史经验可归纳为四个坚持，即坚持“一元主导”与“多元对话”的辩证统一、坚持领导主体与实践主体心心相印、坚持基本国情与时代潮流同频共振、坚持文化根基与世界文明互动融合。而历史启示则可概括为创立者的“真经”、传播者的“真懂”、实践者的“真用”、时代的“真灵”和接受者的“真信”；马克思主义“三化”在实践中必须整体推进，即坚持“三化”互动共进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促进“马中外”三者交融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推进“三形态”有机统一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打造“三元素”的文化产品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凝聚力，构建全方位的“三化”推进机制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辐射力，等等。以上观点都是作者在长期深入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读来颇有新意与启发性。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

书 评

诗两首

赖海榕

仲春赏樱

幽香徐风送，
浓艳满枝排。
一岁苦酝酿，
迎春为君开。
纵然刹那逝，
不辞尽我怀。
明年雪化日，
芳蕊待君来。

凭栏望春

还似去年艳，
白黄红粉葩。
春风依旧是，
已非昨岁花。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

诗歌作品



新疆区委党校

校园风光

读 趣

□杨文礼

“读”为何物？

我琢磨，若从广义上讲，读就是“道”，就是自然法则，包罗万象，无所能免。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正是在阅读自然之书、天地之书、社会之书、人生之书的过程中，人猿相揖别；任何生物要生存、要进化，也离不开经天纬地，适应自然；适者生存，适者就是读者，适应就是大“读”。当然，这个大读，仅靠双眼是难以完成的，得生成、调动、激发、完善全方位的功能，遗传、历练、经验、思想，甚至生命，乃至累代的努力。这个大读，天公地道、天理良心、天空海阔，万物具备、万物可作、万物必行。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生生不已，读读而已。

若从狭义讲，读专指人们的阅读、学习，比起客观被动的自然“大读”，有了种种限制和条件，虽功利了许多、黯然失色了许多，但也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主观能动的必然补充。古今中外，论及读书的格言联璧，令人目不暇接；中国人讲“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为善最乐，读书便佳”。外国人讲“书是唯一不死的东西”“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人类因嗜“读”如命，才告别愚昧的昨天，迎来今天的发展，也必然会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对世界而言，第一要务是和谐；对国家而言，第一要务是发展；对每个人而言，第一要务是读书。

就我来说，乾坤因书大，韵趣缘读长；学习终生事，实践免虚荒。可一周无肉吃，不可一天无书读；可案上无书，不可心中少书。虽读了一些书，也不知对自己有用无用，只求精神满足，反正阅读着就愉快着、充实着。套用笛卡儿的句式：“我读故我在”。自以为得意的阅读是用22个月的业余时间，通读《全唐诗》，摘录笔记五本，七百多页，抄录五千八百多首诗；又用了14个月的业余时间，通读《唐宋全词》。两本书用了整三年业余时间。

对比两本书，有不少感触：一是领悟灵慧对话。正像卡莱尔说的“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全唐诗》收录作者二千余人，五万余首作品；《唐宋全词》收录作者一千八百位，2.5万余首作品。与这么多永恒的灵魂及他们的智慧对话和融合，这是何等让人兴奋和愉快的事啊！二是进一步领悟了丰富和精邃。总体讲，词的创作比诗的创作更活泛些，也可能更艰难些。《全唐诗》中，作品最多的白居易2848首，而500首以上者比比皆是，而《唐宋全词》中，收录最多的是辛弃疾630首，300首以上仅有6人，200首以上16人；连“六十年间万首诗”的陆游，也仅收146首。宋词中，王安石收29首，首首精华；秦观148首，不同凡响。尤为有趣的是宋江仅有两首词，《念奴娇》和《两江月》都相当独特，名传后世。多产的，成家成派，别立一宗；精产的“孤篇横绝，竟为大家”。三是难得的浸淫和熏陶。唐诗宋词，两大艺术高峰，各领风骚，千余年来传诵不衰，影响历久弥新，一直滋润着中华民族的艺术心田，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能领略两大顶巅风光，真是人生幸事，天大的享受。

当然，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读更多的书，而是体验更多的生活意义。正像罗曼·罗兰讲的，读书总是和自己人生的探索自然联系起来。读书贵能疑，疑乃可以启信；读书在有渐，渐乃克底有成。读书的目的在于实践，读书——求知——实践，循环往复，不断前进。歌德讲“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理论要获得生命，必须附着在生活之树——实践上。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原名叫陶知行，认为先学习知识，再附诸实践，后来发现真知识真学问都是从实践、行动中得来的，因而改名为陶行知。他讲：“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礼记》讲：“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陆游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可见读书学习是基础性的，是低层次的，是手段，而最终的目的是实践，猫黑猫白是表象，要害在于逮住老鼠。读书多少说明不了问题，精髓是能办成事。邓小平同志自谦地说他只读了几本马列的书，但邓小平同志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纪，彰写的是社会主义春天的故事。老子说过，大智若愚，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内无外。书法上有大书不书一说，莫非学习上也有一个大智慧者才能达到的最高的境界：大读不读。而下愚如我等者，还是只能“读有益书精神爽，行无愧事梦魂安”。

我读故我在。

（作者单位：陕西省委党校）

随 笔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88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010）62806227 照排：中央党校报刊社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